



外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戈 丹

普列姆昌德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戈 丹

普列姆昌德著

严绍端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戈 丹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商 务 印 书 馆 上 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

书号 783 字数 381,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17 $\frac{1}{8}$ 插页 2

195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9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定价(3) 2.10 元



作者像

普列姆昌德

1

普列姆昌德（真名丹納帕特·萊易）是現代印度的偉大作家，印度進步文學的旗手。他一生辛勤的創作勞動，為後世留下大約三百個短篇小說和十二部長篇小說，對現代印度文學和世界文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的創作標誌着印地文學和烏爾都文學從浪漫主義到現實主義的轉變，因而他在印地文學史和烏爾都文學史上更占有獨特的地位。

除了長短篇小說以外，普列姆昌德還寫過劇本、電影故事、散文、評論以及兒童文學作品。在這些作品里，他以精細入微的觀察和現實主義的手法，通過印度廣大人民喜聞樂見的形式，從各个方面反映了五光十色的印度社會生活，反映了波瀾壯闊的印度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在他的作品里，悲慘的印度農民第一次以真正的主角身份出現。印度社會上長期受到歧視與凌辱的“賤民”和寡婦也在他筆下取得了人的尊嚴地位。正因為他所處理的題材具有重大的社會意義和現實意義，他的作品中洋溢着強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氣息，所以印度人民非常崇敬他，把他看作一位偉大的人民作家。

HAAG 37/02

在普列姆昌德以前，印地文和烏尔都文的小說多半是些神怪离奇的浪漫故事，書中主角也往往是王公貴族和才子佳人，跟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是沒有多大关系的。普列姆昌德在奠立和巩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之后，还不断与同时代的消极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傾向进行斗争。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他说过：“文学的基础是生活。”而文学作品的任务是“对生活作批判性的评价”。由于他在很多作品里无情地揭露了种姓制度和宗教迷信的危害，那些维护正統思想的人們便把他称作“仇恨的传道者”；对这种攻击，他曾在自己创办和主編的文学刊物“天鵝”上发表評論，加以駁斥，题目就是：“文学里需要仇恨”，可見他的爱憎是异常强烈的，而他也善于利用文学这种武器进行斗争。

2

普列姆昌德于一八八〇年七月三十一日生于印度貝拿勒斯附近的拉姆希村。他的祖輩曾在莫臥兒王朝供职，吸收了伊斯兰文化和波斯文化，这种影响决定了他儿时所受的教育，也是他以后能同时以印地語和烏尔都語写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普列姆昌德的一生都是在貧苦中度过的，因此他的作品里自然流露出他对貧苦大众的深厚同情。他父亲原是一个收入微薄的邮局小职员，以后升到一个小邮局的局长，月薪仅四十卢比，很难顧到一家人的温飽。在他幼年时代，父亲的工作常常調动，他也跟着走过很多小城市和乡村，人民大众的疾苦在他稚嫩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以后他做过多年的教师和督学，因工作关系到过很多地方，而且經常到农村視察，这使他对农村

生活更加熟悉，对他的創作有很大帮助。

他七岁时死了母亲，受到后母虐待。还不到十五岁的时候，由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和一位相貌丑陋、脾气乖戾的女人结了婚。这种结婚生活当然不会给他带来丝毫幸福。妻子死后，亲友們劝他再娶，但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社会风习下令人震惊的条件：他要娶一个寡妇。后来他果然这样做了，因而失去了一部分亲友的同情。但他不仅以实际行动反对这种封建传统，而且在部长篇小说“誓言”（“爱”）里又通过艺术形象提出寡妇改嫁的问题。他第一次结婚不久，父亲便去世了，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有成年，供养家人的重担却落在他的肩上。为了维持家用，有一次他不得不在寒冷的冬天卖掉温暖的大衣，又一次在被迫绝食三日之后，他不得不卖掉数学教科书来延续自己的生命。在贫困的物质生活的煎熬下，他表现出顽强的生活意志，先是当家庭教师，接着当小学教员，同时在阿拉哈巴师范学校读书，终于取得了文学士的学位。在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他本来有一个梦想，就是取得硕士学位，然后挂牌做律师，但他的这个梦想并没有实现。他很快就明白了，他要作一个真正的人民大众的律师，他的法庭应该是整个社会，他为之辩护的应该是受压迫与被剥削的人们。为了要作这样一位律师，他决定献身于文学事业。他不仅通过他的创作，为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大声疾呼，他也以文学作武器，为印度的独立自由向英国统治者进行斗争。

他本来是一个业余作家，但到了一九二〇年，在甘地倡导的不与英国政府合作的运动中，他毅然辞去了督学职务，从此便全心全意地献身于文学事业。

普列姆昌德对他所献身的文学事业的确是忠心耿耿的。为

了便于利用这种武器进行斗争，他除了创作以外，还想办自己的刊物和出版社，以免受到刊物编辑与出版商人的剥削和限制。他先后创办了大型的印地文学月刊“天鹅”和“觉醒”周刊，又在贝拿勒斯开办了沙拉斯瓦蒂出版社。在他办出版社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成名的作家，创作上的收入相当丰厚，但他的收入除了维持必需的生活之外，全都用来经营出版社，甚至他妻子给他治病的钱，他也用在出版社上面去了。出版社的盈余却又用来填补两个刊物的亏损。就这样，他以创作养出版社，以出版社养两个刊物，自己呕尽心血，日以继夜地从事创作和编辑劳动。他因为从童年起就过着穷困的生活，营养不良，染上了慢性痢疾，身体一直很衰弱，现在竟以衰弱之身，肩负起如此沉重的担子，要没有过人的毅力，如何能胜任！何况他这一副担子，是在异族统治和反动势力极其强大的逆境中承受下来的，他忧虑的不仅是经济上的窘迫，还有政治上的厄难，而这两种打击往往会同时落到他的头上。“天鹅”创刊才半年的时候，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触怒当局的文章，政府勒令缴纳保证金，结果他无法缴纳，一度被迫停刊。复刊后才出了两三期，他自己写的一个短篇小说“杀人犯”又引起了一场风波。尽管刊物受到这许许多多的折磨，但普列姆昌德仍然不屈不挠，象热爱自己的子女似的热爱着它，病中也要挣扎着替它撰稿。在他的关心培养下，刊物确也象岩石缝里的一株青草，顽强而茁壮地不断生长。这个刊物在现代印地文学的发展上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甚至被认为印度进步文学的一面光辉的旗帜，因为英国统治印度之后，印度的民族文学受到忽视，这样一个有进步思想指导的大型文学刊物，既可以通过艺术的感人力量，鼓舞印度人民起来争取祖国的自由独立，同时也让新的作家有机会发表他们的作品，使得印地文学的园林不

致因为异族統治者的忽視而荒凉冷落。普列姆昌德在培养新作家方面的功績，人們至今还在称道不已。

为了維持“天鵝”与“觉醒”这两个刊物，普列姆昌德不得不在一九三四年应約到孟买的一家电影制片厂去工作。他在那兒写了三个电影故事：“紗厂工人”，“流刑犯”和“新生活”。“紗厂工人”描写在当时不景气的情况下資本家与工人之間的尖銳矛盾，但这种矛盾由一个仲裁机构加以調和了。“流刑犯”所写的也是同一題材，但比前者跃进了一步。紗厂主趁着当时印度全国推行国貨运动的机会，提高布匹的价格，同时又借口粮价下降，想要削減工人的工資。工人們提出要求，厂主置之不理，于是，矛盾的解决自然采取了階級斗争的方式：工人們全体罢工了。制片商原以为这是“热貨”，可以一本万利，就照样拍成电影，但检查时无法通过，以后制片厂虽然刪去了很多情节，又增加了不少庸俗的場面，孟买政府还是禁止上演，仅仅在沒有工厂的旁遮普上演一个短时期，接着也遭到禁止。以后制片厂又作了許多努力，連影片的名字也改成了“穷苦的工人”，才被准許上演，因为穷苦工人的遭遇可以使那些紳士淑女和达官貴人抒发一下悲天憫人的情怀，而战斗的工人却只会給他們带来恐惧。这件事使普列姆昌德很伤心，合同还没有滿期他便毅然离开孟买回到貝拿勒斯去了。

他回到貝拿勒斯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但这两年，无论对他个人或对整个印度文学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他在这两年里写下了他的短篇杰作“尸衣”（“可番布”）和他的长篇代表作“戈丹”，而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他主持了全印进步作家协会的第一次大会，并且亲自参加大会宣言的草拟工作。为了体现大会宣言的精神，他还开始写了最后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圣

綫”，又准备再办一个文学刊物，遗憾的是，当“圣綫”尚未写完、新的刊物还没有诞生的时候，他却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与世长辞了。

在他逝世以前几个星期，高尔基逝世的消息使他受到沉重的打击，这是因为高尔基对他的影响已逐渐超过原来托尔斯泰对他的影响。因此，他虽然病势垂危，还是挣扎着写下一篇悼詞，而且坚持要到追悼高尔基的大会上去致詞。事后他曾对他的妻子說，总有一天，印度人民会把高尔基当作他們自己的作家来爱戴的。

在全印进步作家协会的第一次大会上，他曾以主席身份发表了一篇題为“文学的意义”的演說，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在优秀的文学作品里，应该具有崇高的思想、具有对自由的热爱和創造的冲动，应该显示出生活的真实面貌，——它应该使我們行动和斗争，使我們产生激情，而不是讓我們昏昏欲睡，因为现在再要昏睡就是死亡的象征。

这一段話給普列姆昌德自己一生的創作作了很好的写照。

3

普列姆昌德生活的年代是英帝国主义統治印度的后期，也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而他三十六年的創作历程（他于一九〇一年开始发表作品），恰好包容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三次高潮时期。要了解普列姆昌德的作品现实意义，我們得同时簡略地談談这三次斗争高潮的經過。

第一次高潮是一九〇五至一九一〇年。引起这次高潮的近因是孟加拉的分治，但促成这次高潮的却是当时的世界形势：是

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初步胜利。而这个革命是具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日俄战争）性质的民主革命，这给予殖民地人民以巨大的冲激力量。这个新的形势在印度也自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使觉醒了的印度人民受到很大的鼓舞。这次斗争采用了比以往更激进的、对统治者实行经济绝交的方式，而领导斗争的国民大会党也在一九〇六年正式宣布以争取自治为目标。

在这个时期，普列姆昌德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热爱祖国”（一九〇七）署着他的真实姓名出版了。这集子里的几个短篇，都洋溢着蓬勃熾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其中一篇把为祖国抛洒的最后一滴热血比作世界上最珍贵的珠宝。该书出版后，立即被英国政府禁止发行，而且把搜罗到的五百本公开焚毁，同时警告作者，如果他再写类似的作品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警告并没有吓倒作者，从此以后，他改用普列姆昌德的笔名继续战斗。

第二次高潮是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二年。这次高潮比第一次声势更为壮大，是真正群众性的反帝运动，因为帝国主义的整个结构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震荡，特别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推动了世界革命的浪潮，英印关系自然也跟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九一九年初，由于英国统治者施行一项罗拉特法案，想在战时法令失效后仍继续保持政府的特殊镇压权力——免除正常的法院程序，不经审判即行监禁，这使得全印各地群情激愤，展开了规模空前的罢工。甘地也组织了消极抵抗的不合作运动来反对罗拉特法案。印度全国人民出现了空前团结的现象，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并肩作战。斗争力量的强大引起统治者更残酷的镇压。到了一九二〇年，国大党通过“非暴力的不合作”的斗争政策，号召斗争参加者放弃英国政府授予的称号，对

立法机关、法院和教育机构实行抵制，同时恢复手工紡織，将来逐渐走向抗稅的最后阶段。但是，“非暴力的不合作”斗争并不能阻止群众的暴力行动，因为当时联合省的一个村庄乔里乔拉的农民群众在愤怒的情緒之下捣毁和焚烧了該村的警察局，造成了二十二名警察的死亡，于是甘地不得不宣布停止整个的和平抵抗运动。

由此可以看出，印度当时的自由斗争的确具有了一定的群众规模，已經深入到农村里去了。也可以說，印度的农民运动是跟整个自由斗争結合在一起的，只是那时候印度无产阶级还没有成长起来，还没有形成一种领导力量，因此农民运动还只是自发性的斗争，而不是有組織的斗争。这样的斗争結果当然是失敗。

普列姆昌德的第一部长篇巨著“仁爱道院”和剧本“斗争”就真实地反映了这第二次的斗争高潮时期。“仁爱道院”写于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二年出版，可見作者的确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面对着印度严峻的现实，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捉笔写成的。小說的題材是农民反抗地主和殖民統治的斗争。作者通过一个青年农民巴尔拉吉的口，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表现了无限的向往。書中深刻地描繪了印度农民所受的种种压迫、剝削以及他們的悲惨貧困的境遇。有一个善良的农民瑪諾哈尔，在跟别的农民一样受尽地主的欺凌之后，又知道他的妻子受到地主爪牙高斯坎的侮辱，于是他忍无可忍，和他的兒子巴尔拉吉一起把高斯坎杀死了。这是普列姆昌德的作品里最明显地描写了暴力反抗的小說。尽管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他們的反抗只能是自发的、个别的，而不是有組織的、集体的，但它表达了群众的真正的要求。剧本“斗争”也是描写农民

反抗地主和殖民統治的。从这个充滿战斗气息的剧本里，我們可以听到印度人民爭取自由独立的响亮的声音。剧中主角这样宣布說：“我也会杀人。可是，我不杀軟弱的人。我光杀那些有武器的人，那些勒索穷人的家伙，杀那些糟蹋穷人的名誉和破坏他們家庭的人……”不用說，在那高潮时期，这样的作品曾經大大地鼓舞了印度人民的战斗意志。

一九二八年印度工人的大罢工运动，目的是在对英国政府派遣的西門調查团^①示威，結果却成了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的第三次斗争高潮的先声。我們知道，自从二十年代中期印度产业工人阶级出現以后，社会主义思想便开始在印度发展，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因素，而且在青年一代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左翼人士中产生了影响，这使得国大党一九二七年年底在馬德拉斯举行的會議上通过了以爭取完全独立为目标的決議，到了一九三〇年一月廿六日，全印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庆祝第一个独立日，号召人民拒絕納稅，抵制英貨，破坏盐稅法等。这些活动都是属于和平抵抗的范畴的，但广大群众一經行动起来，运动的規模和声势都远远超越了約定的范畴，使英国統治者感到异常恐慌，結果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便采取残酷的鎮压手段。

普列姆昌德反映这一个斗争时期的作品，可以拿长篇小说“盜用公款”和“战場”以及短篇小说集“进军”为代表。“盜用公款”写于一九三〇年，作者在这部小说里淋漓尽致地描繪了印度中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活动，是他以中产阶级生活为題材的成功之作。書中的一个小販曾对当时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

① 該調查团的任务是要解决印度未来宪法的命运的，但調查团中根本沒有一个印度代表。

分領導人物作了極其尖銳的指責。“戰場”寫於一九三二年，以一九三〇年的堅持真理運動為背景，故事中心是農民的抗租運動。從這本書里，我們可以嗅到當時轟轟烈烈的鬥爭氣息。“進軍”在一九三二年出版後，曾被英國政府禁止發行，因為這個集子里所收的短篇都洋溢着反對英帝國主義統治的、愛國主義的熱情，是當時堅持真理運動的真實寫照，也是號召人民群眾向統治者進軍的响亮号角。以作為書名的“進軍”一篇來說，印度農民那種如火如荼的、反帝救國的赤誠，特別是老婦人璫利那種愛國不肯後人的精神，的確是令人激奮的。

除了上面舉出的、與當時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三次高潮緊密結合的作品外，普列姆昌德還在另一部重要的長篇小說“舞台”（一九二七）里以更加廣闊的圖景概括了那個歷史時期的精神面貌。作者通過書中主角蘇爾達斯保卫自己土地的鬥爭，表現出印度古老的鄉村經濟和強大的資本主義勢力的沖擊。蘇爾達斯的鬥爭武器是“堅持真理”，但結果他自己承認失敗了。

然而，被公認為普列姆昌德的代表作的，是他描寫印度農民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戈丹”（一九三六）。這是他三十六年創作生涯的結晶，也是印度現代文學的碩果。印度的進步文藝批評家和蘇聯的印度文學研究者都認為，這部小說應該列入二十世紀上半期世界優秀文學作品之林。

4

“戈丹”是印度農村生活的一部史詩。在這部小說里，作者以精煉朴素的語言，描繪出三十年代印度農村的一幅陰暗悲慘的畫圖。

在三十年代，印度人民还在英帝国主义者的统治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特别是在广大的印度农村里，农民直接遭受帝国主义的爪牙（警察）和大小封建主、地主、土地承租人（这种承租人再一层层分租出去，而有二地主，三地主直到二十多层）、高利贷者的重重压迫和剥削。种姓制度的魔影又时时威胁着他们。他们虽然劳碌终年，还是免不了在饥饿线上挣扎。“戈丹”的主角何利就是这些亿万农民的典型，书中所写的柏拉里，也就是印度农村的一个缩影。

何利的性格是那么纯朴、善良，因为从小受着古老的封建礼法和宿命论的影响，对宗教和权势怀着深深的畏惧，一切都逆来顺受，宁可自己吃亏，不愿违背“为人的道德”和丧失家门的“体面”。他的生活信条是：“住在水里，不能跟鳄鱼作对。”他也喜欢说：“别人的脚踩在自己身上，只得放聪明点，在那脚底板上抓抓痒。”因此，他跟书中的地主莱易老爷常常有些来往，还以为这种关系给他自己带来了莫大的好处。他不知道他的毁灭正是这些人促成的。

他具有一个纯朴的农民的种种优点和缺点：诚实而又有点狡诈，谦逊而又有点傲慢，软弱而有韧性，自私而又富于同情，——总之，是私有制社会里处处受到折磨的一颗善良的靈魂。他也象千千万万的印度农民一样，生平唯一的梦想是买一头母牛，因为在印度教社会里，母牛不仅能够生产牛奶，而且是吉祥的象征和膜拜的对象。他的这个梦想是貫串全書的主要线索。

故事开始时，他向邻村的牧人薄拉赊买了一头母牛，这头牛才到家里，他的弟弟希拉由于妒嫉便把它毒死了。警察想借此机会勒索敲诈，要搜查希拉的家，何利为了保持家门的“体面”，

宁可发誓說母牛不是希拉毒死的，并且甘願向高利貸者去借債来賄賂巡官。与此同时，他的兒子戈巴尔爱上了薄拉的女兒婁妮姬——一个年青的寡妇，而何利和他的妻子在复杂矛盾的心情中，终于不顧社会习俗的羈勒，大胆地把已經怀孕几个月的婁妮姬收留在家里，因此，那些以卫道者自居的村里长老会的長老們認為这是伤风敗俗、不可饒恕的罪过，他們开除了何利的教籍，后来又罰他一百卢比現金和三十滿粮食。何利把地里的收成全部繳作罰款，又把祖上传下来的房子抵押出去，才算履行了长老会的“判決”，从而恢复了他的种性。

何利一生的劳动是一出大悲劇。他太善良了。地主、高利貸者、祭司、警察，都想劫夺他的劳动果实。村里的几个高利貸者，没有一个不是他的債主。他收获的粮食在打谷場上就給搶光了，他的甘蔗或者被法院拍卖，或者被糖厂收买，無論哪一种情形他自己都不能拿到一个錢。永远陪伴着他的是各种各样的阴谋和灾难。到了最后，他的境遇淪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以致无法按照社会习俗来賠嫁他的第二个女兒，只得把她变相地卖给一个老头兒作妻子，借此繳清欠租，免得地主抽回他所种的地。他平日最講究维护家門的“体面”，这时一切的“体面”却都喪尽了。他生下来就受苦，苦够了就死去，而他終身唯一的梦想还是没有实现。他活着的时候，那个祭司兼高利貸者——婆罗門达塔丁曾經剝削过他的劳动，他临死时，同一个达塔丁又从他的冰凉的手里搶走了他积攒下来准备买牛的二十个安那，作为替他净化灵魂的代价！

何利的妻子丹妮姬也是書中刻划得很成功的人物。她大胆、泼辣，跟丈夫的性格形成了鮮明的对比。当警察局巡官向何利进行敲詐时，她敢于当面斥責巡官。当村里长老会作了不公

平的判決時，她敢於不顧一切，提出了義正詞嚴的抗議。她外貌冷峻，心地却很溫厚。她跟何利一樣有着熾烈的愛憎，但他比何利更能不理睬人們的閑言和冷語。在普列姆昌德塑造的婦女群象中，丹妮婭的叛逆性格表現得最為突出。何利主張一切都逆來順受，她却想在那暗無天日的社會里分清一個是非。但是，她雖然常常站在真理的一邊，她却從來沒有嚐到過勝利的喜悅。他只好靠着自己的尖嘴利舌，讓街坊鄰里對她存着幾分畏懼，只好以她那蔑視一切的孤獨的驕傲，向村人頭腦中根深蒂固的宗教偏見以及人吃人的社會制度進行公開的挑戰。她跟何利因為把裘妮婭收留在家里而受到開除教籍的處分之後，村里的人都和她家斷絕了往來，但她以為，教族既然不理睬她，她也不必理睬教族。正因為她是這樣倔強，她跟何利時常吵嘴，有時甚至打架，但這只是他們的單調生活中的點綴，其實他們的愛情是真摯的、永恒不渝的。他們兩人是一對淳樸而善良的農民夫婦。

書中着重描寫了地主和高利貸者對農民的剝削。因為故事的背景是一個處於封建狀態的農村，地主剝削農民的方式顯然是封建性質的，如地主萊易老爺慶祝盛大節日時，他可以公開地要田莊上的佃農們去送節禮。平時，他可以強迫佃農服義務勞役，可以任意加租退佃，對佃農的命運掌握着生殺予奪的大權。他催收欠租的手段也是非常惡毒的。在長久天旱之後落了一場大雨，農民們正歡欣鼓舞地準備下地耕種時，地主的管事先生突然帶來地主的命令：沒有繳清欠租的人，不准犁田！在這骨節眼上，佃農們有什麼辦法呢？他們只得跑到高利貸者那兒去求救了。

萊易老爺不僅是地主，而且是省議會議員，既篤信宗教，又善於舞文弄墨。他參加過印度的自由鬥爭，坐過監獄，跟農民說